



唐代京兆韦氏家族与文学研究

Research on the Wei Clan from Jingzhao Area and
Their Literary Achievements in Tang Dynasty

王 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唐代京兆韦氏家族与文学研究

Research on the Wei Clan from Jingzhao Area and
Their Literary Achievements in Tang Dynasty

王 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京兆韦氏家族与文学研究/王伟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6
ISBN 978-7-301-25814-9

I. ①唐…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唐代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95834号

书 名 唐代京兆韦氏家族与文学研究

著作责任者 王 伟 著

责任编辑 徐 迈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5814-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6467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毫米×1020毫米 16开本 25.5印张 插页10 445千字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70.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序 言

李 浩

王伟博士的《唐代京兆韦氏家族与文学研究》一书即将梓行,问序于我,因为本书是他博士论文的修改稿,我曾忝为他论文的指导老师,与作者和论文都有些“连带”关系,故乐于作些介绍。

上世纪90年代,我随霍松林先生读书,当时苦于学位论文选题无新意,于是避熟就生,从“地域—家族”的视角入手,选取《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为题,后来又南下沪上随王水照先生做博士后研究,提交了《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的报告,一眨眼十多年的时间就过去了。我当时剑走偏锋,有关“地域—家族”的研究也未成风气,更没有后来这样持续的热闹。没料到歪打正着,竟然撞上了这一20世纪学术的大潮流。回想起来,感慨良多。故后来自己指导学生时,也有意识引导更年轻的学人朝这个领域走。其中随我读书且受到我“忽悠”者,王伟选京兆韦氏,邵三亲选河东裴氏,高淑君选江南陆氏,和谈选辽金时期的耶律氏,还有一位硕士选了东平吕氏。他们分别就相关家族个案进行了较细致的爬梳,也有自己的新开拓。

我一直以为,进行中国古代家族或士族研究,选择隋唐时期有很多先天不足,衡之以标准,隋唐士族没有魏晋南北朝士族典型,又缺乏明清及近代家族丰富的谱录资料。前人之所以措笔较少是有具体原因的。至于家族与文学的因缘关系,更让人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感慨。文学史研究毕竟首先是一种史学研究,胡适先生讲:“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应该成为我们学术共同体的基本守则。在学术研究上,后学者亦如拓荒者,肥美膏腴之地已被先一轮圈地者圈走,他们只能在贫瘠不毛的边疆垦荒。好在他们踏实肯干,又富春秋,假以时日,经之营之,也一定能将学术的南泥湾变成塞上好江南的。

王伟此书共11章,文后还有4个附录。全篇以唐代京兆韦氏为中心,梳理其家族文学发展的脉络,探讨社会、历史、地域、学术思潮对家族文学创作的影响,而后在家族文学本位的基础上,用“自下而上”的方式重新审

试读结束, 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视唐代文学史,作者还提出“层累式”的家族文化建构说,强调具有整合色彩的家族文化观。通过韦氏家族文学个案的具体解剖,来推助中古文学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古代地域文学研究也具有场景复原和文化再现的作用。

另有一事也很有意思,时下媒体热议家教与家风,跟进者甚多。殊不知这是家族研究的基本套路,古人的高见就不必说了,我在《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一书中已立专章讨论关中士族教育,还特意用一节篇幅谈家教,引用钱穆先生的名文和陈寅恪先生的名言,并进行引申发挥。王伟书中也辟出一章研究韦氏的家学与家风。于当代社会祭出家教家风来挽救世道人心,不禁让人感慨系之。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欠缺,如对韦氏家族个案叙述较详,但如何突破固有的家族文学言说模式,创新家族文学研究的话语体系尚需不断努力。又如研究基本停留在整个家族和个别成员,对家族房支内的文化文学活动仍有待进一步的开掘和梳理。

王伟博士正当学术研究的盛年,在本书之前已刊印了博士后出站报告《唐代关中本土文学群体研究》,模糊的学术面孔逐渐清晰起来。希望他能以此为契机,在学术目标上追求“第一义”,既能“照着讲”,又能“接着讲”,既有国际视野,又能本土创新。

中古以降,文运南迁,故关陕地域日渐沉寂,本土人物稀疏。但宋明以迄民国时期仍有张载、韩世忠、康海、李梦阳、冯从吾、李二曲、李因笃、刘古愚、于右任、吴宓、张际鸾等乡前贤,或以德行,或以义勇,或以忠烈,或以艺文,或以技能,彪炳史册,为这一方水土争了不少体面。“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新世纪以来,枢机重启,希望王伟这一代年青的陕籍学人,不仅与时俱进,更能抗志希古,能在故籍神皋中书写出自己的名山事业,始无愧于河岳英灵。我虽逐渐衰朽,但正如锋煮兄所谓,也愿侧身道旁为年轻的选手们做啦啦队。

2014年4月30日草成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韦氏族姓溯源与士族地位确立	14
第一节 韦氏族姓溯源	14
第二节 韦氏家族的形成	18
第三节 韦氏士族地位的确立	27
第二章 隋唐时期韦氏家族的政治地位	31
第一节 隋唐之前韦氏家族的政治地位	31
第二节 入隋后韦氏势力的巩固与发展	38
第三节 唐代韦氏家族政治地位的全面提升	43
第四节 《韦匡伯墓志》与隋唐变局	48
第五节 中宗朝政局与东山宴饮之关联性	60
第三章 唐代京兆韦氏的家学与家风	72
第一节 韦氏家学的《诗》《礼》转移	72
第二节 韦氏家学的诗文共进	78
第三节 韦氏家学的艺术追求	82
第四节 韦氏的孝悌尚俭家风和谨严家教	87
第五节 韦氏家族女性成员的精神生活 ——以佛教信仰为中心	92
第四章 科举与唐代京兆韦氏	98
第一节 唐代士族与科举	98
第二节 韦氏家族登科情况辑考	102
第三节 韦氏登科分析	105
第四节 科举对韦氏家族的推助之功	112
第五节 科举与韦氏势力的式微	117

第五章 唐代韦氏家族的婚姻	123
第一节 韦氏士族圈内婚研究	123
第二节 韦氏与李唐皇族的婚姻	135
第六章 韦氏家族文学概况	144
第一节 韦氏家族著述	144
第二节 韦氏家族文学创作概况	150
第三节 韦氏家族文学在唐代的接受状况	154
第七章 韦氏家族的文学交往	159
第一节 韦氏家族文学交往的形式	159
第二节 韦氏家族文学交往的特点	164
第三节 韦氏家族文学交往的意义	170
第八章 韦氏家族与中宗景龙时期诗坛	173
第一节 景龙时期韦氏家族政治、文学活动编年	173
第二节 景龙朝韦氏诗歌创作特点及文学史意义	181
第三节 景龙三年东山宴饮诗作之文化意义论析	187
第九章 韦应物诗歌的家族意识	192
第一节 韦应物诗中的家族情怀	192
第二节 韦应物族内交往诗之家族意识	196
第三节 韦应物悼亡诗中的恩爱亲情	203
第十章 韦庄文学活动研究	206
第一节 韦庄在杜诗接受史上的位置 ——以《又玄集》为中心	206
第二节 韦庄讳言《秦妇吟》之原因述评	213
第十一章 韦绚、韦瓘生平著述考	220
第一节 韦绚生平及履历考辨	220
第二节 《刘宾客嘉话录》考论	224
第三节 韦瓘生平考辨 ——兼论《周秦行纪》	230

附录一 唐代京兆韦氏家族重名者考辨	244
附录二 唐代京兆韦氏家族成员活动编年	272
附录三 唐代京兆韦氏士族圈内婚姻情况统计表	358
附录四 汉—唐时期京兆韦氏家族房支、谱系发展图	366
参考文献	384
后 记	396

绪 论

本书主要对京兆韦氏家族的族源及韦氏家族在唐代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家族文化进行全面考察,对其家族文学全貌和重要作家作品、文学事件进行研究,并以此为个案,对唐代士族在文学发展中的重要性进行全面把握和判断。

一 研究意义

家庭是人类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是以特定的婚姻形态为纽带结合起来的 社会组织形式。家族则是以家庭为基础的联合体,由具有共同祭祀祖先的若干同姓个体家庭(已分居、异财、各爨),循照一定规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而成的一种特殊社会组织形式。以血缘关系为主的家族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不仅深刻影响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秩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历史发展的进程。仅就中古历史而言,家族形态由两汉豪宗强族,至魏晋演变为门阀士族,成为南北朝时期最有力量的社会势力,牵制当时历史文化的构成与走向。隋唐期间,南北朝延续下来的世家大族,依然占据政治和文化的有利地位,对政治权力结构、人才升降、社会阶层流动产生不小影响,甚而触及唐宋变革的主要层面,推助中国封建社会家族构成与发展形态的转型。此外,家族也是具有文化特征的社会组织,“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地不可分离”;“学术之传授既移于家族,则京邑与学术之关系不似前此之重要。当中原扰乱、京洛丘墟之时,苟边隅之地尚能维持和平秩序,则家族之学术亦得藉以遗传不坠”^①。可见家族作为最基本的文化单元,对于中古教育兴替、文化赓续、学术传承亦具有重要影响。文学是诸多文化元素中最富生命意识和感性活力的部分,其发展创变无疑受制于地域自然环境和作家自幼濡染的家族环境。对于文学家而言,家族是与之血脉通连的母体。因此,文学文化研究应当重视家族问题。至少在研究古代宗法社会背景下的文学家、文学作品时,

^①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三联书店,2001年,第20、23页。

将家族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具有毋庸置疑的正当性。

中国古代家族相关问题的研究,自古至今皆受到学界重视。封建时代的家族问题研究多集中在西周以降渐趋成熟的宗法制家族制度上。宗法制度的实质是反映和维护当时家族制度的规范与办法,其内容主要见载于《礼记》的《丧服小记》《大传》和《仪礼》的《丧服传》等文献中,《公羊传》亦偶有提及。最早对宗法制度进行研究与解释的学者,是为《礼记》《仪礼》等书作注疏的汉代学者郑玄、何休和唐代学者孔颖达、贾公彦等,但他们的研究仅停留在字句的解释。北宋理学家张载的《理学理窟·宗法》篇,是迄今为止最早研究家族制度的论文,首次对宗法制背景下的家族制度做出全面解释。至清代,家族制度已逐渐成为学者研究的重点,可资参考者有毛奇龄《大小宗通释》、万斯达《宗法论》、程瑶田《宗法小记》、侯度《宗法考》、冯桂芬《宗法》。这些学者多以考据见长,故《礼记》《仪礼》中有关宗法制的记载经其考释,多能文从字顺。但其研究的缺陷是仅就文献解释文献,而未能将辞章考据放置于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阐释与分析。近现代以来,专论古代家族制度者以吕思勉《中国宗族制度小史》、陶希圣《婚姻和家族》、高达观《中国家族社会之演变》、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等最具代表性。如将吕思勉《中国宗族制度小史》与其后来撰著的《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四部大型断代史中相关家族制度和婚姻家族形态的章节合观,无疑为家族制度史研究的深入提供较为重要的参考。吕思勉几乎将正史中有关家族与婚姻的材料搜罗无遗,并加以细心排比与分析,为学界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在对家族制度本身进行研究的同时,20世纪学术界也以家族发展为中心,从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文学史等学科领域出发,将家族放置于特定历史阶段进行研究,得出一系列富有创见的学术观点,从而推动整个文史研究领域的发展。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王伊同《五朝门第》、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毛汉光《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等著作即为代表。新时期以降,研究家族的传承发展及其对中古文化建设的作用,渐趋成为诸多著述的研究内容,如颜普元《颜氏家学与风徽》、方北辰《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郭锋《唐代士族个案研究——以吴郡、清河、范阳、敦煌张氏为中心》、陈明《儒学的历史功能——士族:特殊形态的知识分子研究》、章义和《地域集团与南朝政治》、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和王力平《中古杜氏家族的变迁》、黄宽重《宋代的家族

与社会》等。但上述论著的共同特点是,较多关注家族在政治、文化、社会层面的升降荣辱,而较少措置家族文学的嬗变轨迹。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此种状况有所改观。许多学者开始从家族文化或地域文化角度去阐释文学现象并剖析其内在机理。如曹道衡《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陈郡阳夏谢氏:六朝文学士族之个案研究》、李浩师《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进入新世纪,家族文学研究持续走热,如浙江师范大学以梅新林教授为首组成了“江南文化研究中心”,面向全国招标,并陆续推出“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数十种;山东大学则成立了“齐鲁文化研究中心”,集聚山东省内学者,拟推出“山东文化世家研究丛书”30种。这些丛书的选题大都与家族文学关系紧密,对于推高家族文学研究浪潮颇具助益。关于家族文学研究也涌现出一批重要成果^①。上述学者通过对特定地域的家族进行系统研究,深挖家族政治地位、地域文化对于独特家风、家学的形成以及对于文学观念、文学创作、文学成就等方面存在的潜在影响,从而论证家族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并借此为文化文学研究进行场景复原和文化还原。一时间,家族文学研究成为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热点,这种研究热潮不仅体现在诸多刊物编发的稿件上,也表现在不断涌现的学术专著的选题上,还表现在以国家社科基金为代表的各层次项目的申报指南和立项题目上,甚至目前高校中文专业最为通行的《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第二卷修订版也将“文学家族、宗族与伦理”设为专节,标志家族文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已进入高校课堂,普及之势渐成。

我们不难发现,关于中国古代家族与文学研究的相关成果,绝大部分集

① 这方面成果多集中在宋代及其以后的文史研究领域,主要是因为宋代以后传世文献相对丰富,研究者易于选题和开展研究,成果问世较多。本世纪近十年出现的宋代家族文学研究专著主要有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汤江浩《北宋临川王氏家族及其文学考论——以王安石为中心》(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北京出版社,2006年),何新所《昭德晁氏家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刘学《词人家庭与宋词传承——以父子词为中心》(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8年),王毅《宋代文学家庭》(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张剑、吕肖奂、周扬波《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宋代以后的家族文学研究又有李真瑜《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论考》(香港国际学术文化资讯出版公司,2003年),王建科《元明家庭家族叙事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朱丽霞《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凌郁之《苏州文化世家与清代文学》(齐鲁书社,2008年),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岳麓书社,2008年),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张剑《清代杨沂孙家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徐雁平《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凤凰出版社,2010年),罗时进《地域·家族·文学:清代江南诗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中于魏晋南北朝和宋、明清时期。此种研究格局的形成,或是基于史学、社会学等相邻学科扎实的研究基础,或是由于相关存世文献史料丰沛易得。然而隋唐五代的家族结构形态、发展范式等出现巨大转型,家族与文学研究的成果却为数甚少。以唐代家族文学研究为例,在本人博士论文完成之前,仅有李浩师《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李建华《唐代山东士族与文学》等数部著作。2009年笔者撰成《唐代京兆韦氏家族与文学研究》一文并提交博士论文答辩后,又有吉林大学孟祥娟《隋唐京兆韦氏家族文学论考》(2010年)、西北大学郃三亲《唐代河东裴氏与文学》(2011年)、武汉大学汪仕辉《唐代士族家学研究》(2011年)、苏州大学梁尔涛《唐代家族与文学研究》(2012年)、山东师范大学许智银《唐代临淄段氏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2012年)、西北大学高淑君《唐代吴郡陆氏家族与文学研究》(2013年)、北京大学张丽《北齐隋唐河东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2013年)等博士论文次第面世。此外,部分硕士论文亦以唐代家族文学为选题^①。与魏晋南北朝和宋、明清时期的家族文学研究成果数量相比,唐代家族文学研究无疑稍显薄弱,仍具可供开拓的空间。此外,在研究之理论建构上,唐代家族文学缺乏成熟的研究理论,当然这种情况在其他时段的家族文学研究中同样存在。当前家族文学研究所表现出来的“热”,其实是一种个案研究之“热”,是一种“虚热”。如果没有系统的研究理论进行导引,那么由“热”转“凉”就只是时间问题。而且,当前无论是在史学、社会学还是在文学研究领域,家族研究普遍呈现出描述化、模式化的趋势。这种研究方式的优点在于,可以相对简单清楚地呈现家族血缘承继的谱系及家族文学风格表面的相似。但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难以烛照家族文学的深层规律与细部脉络,以致家族文学研究多止步于量的积累,而少质的突破,甚至使家族文学研究沦为家族血缘的历史研究和家族成员作品的简单汇集、评价。而家族谱系及家族文化文学文献整理、家族文学整体发展趋势和具体家族成员创作的分析、家族文学与外部因素(政治、经济、文化、文学等)的比较研究和关联性研究、家族文学成员及其创作之间的相互比较(含异代间纵向比较和同代间的横向比较两个维度)、家族文学的人文意识等五个方面,却少有标志性成果,这些成为学界研究的弱项或盲区。

目前关于家族文学研究理论方面的文章较少,颇具新见者有罗时进《关

① 近十年硕士论文以唐代家族与文学为题目者,主要有郑屹《西汉至唐韦氏宗族研究》(2013年)、王新立《唐代窦氏文学家族交游与创作研究》(2012年)、孟子勋《唐代弘农杨氏家族文学研究》(2012年)、李杨婷《唐代薛氏西祖家族与文学研究》(2012年)、邓军《唐代柳氏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2010年)、田玉芳《五窦及其诗歌研究》(2006年)等。

于文学家族学建构的思考》、张剑《家族文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及文献——对宋代以降家族文学研究的若干思考》、李朝军《家族文学史建构与文学世家研究》等文。罗时进在文中倡议建立“文学家族学”的学科研究方向,并界定其“旨在将家族学、地域学、文学贯通起来,在历史学、社会学、文学的多边互镜中重现文学知识生产的社会历史语境,力求揭示文学创作的基层活动状况,用家族写作的具体事实乃至细节,形成文学创作的动态过程,从而显示文学演变的真实轨迹,并寻求某种发展规律”^①。在此基础上,张剑将家族文学的研究理论继续推进,他认为“家族文学应当具有社会学和文学的交叉性质。但家族文学研究既非简单的社会史的研究,又非单纯的文学史研究,而是以文学为基点,将家族视为独立的社会单元,重点探讨其内外要素对文学的影响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张剑将家族文学研究的基本范畴划分为两点,即文学的家族研究和家族的文学研究。具体而言,文学的家族研究既有家族史研究的一般性内容,又有自身的特殊性,其一般性内容主要指家族的“四态”,即结构形态、环境生态、活动状态、发展变态;而其特殊性,即应突出家族研究的文学性因素。家族文学研究中的“四态”研究,目的应在于回答家族文学的生成问题,否则就无法将其与其他研究区别开来。家族的文学研究方面,须遵循文学史的一般规律,拥有世界、作家、作品和读者四个维度,以自身特色充实文学史研究,有效补充和丰富文学史面貌。^② 尽管这些理论探索多聚焦于唐以后的家族文学研究层面,但其中所体现出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却对于指引整个中国古代家族文学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对于家族文学研究走向深入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具体到本书研究对象上看,京兆韦氏是中古时期的重要家族,其“本枝百代,衣冠四海,备于载籍”,茂牒家声,昭彰不殒。入唐后,家族人物历仕华省,蝉联相袭,傲视关右,世称鼎甲。它在唐代历史中所具有的重要政治、文化地位,以及它对当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其在整个关陇士族圈中极具代表性。按之以史,我们发现自西汉昭帝以后韦氏家族作为关中大族已逐步发展壮大。汉魏以降,韦氏作为关中“世族”“著姓”频频见诸史料,其社会地位和文化地位已基本确立。至唐,韦氏家族更是步入了发展的黄金阶段。其九著房,见于两《唐书》记载的人物就有九百余位。他们大都活跃于唐代的政治文化舞台之上,仅出任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人数就有百余名,而出任宰相者

① 罗时进:《关于文学家族学建构的思考》,见《江海学刊》2009年第3期。又见《地域·家族·文学——清代江南诗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45页。

② 张剑:《宋代以降家族文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及文献问题》,《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第32—33页。

则高达20名^①,将同为著族的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河东裴氏等压至身后^②。韦氏家族亦多与皇族通婚,隋时就有王妃3人,至唐则先后有皇后2人,皇妃5人,驸马10余人^③。此外,京兆韦氏还与山东自诩“势侔皇家”的五姓七族互为婚媾,社会地位之贵几乎无以复加。

不仅如此,京兆韦氏还在文化舞台尤其是文学创作领域表现出色。据笔者对《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全唐文补编》《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续编》以及《全唐文补遗》(1—9册)的粗略统计,现存韦氏成员的文章数目为二百篇左右,作者七十余人。再据《全唐诗》《全唐诗外编》《全唐诗补编》以及《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的统计,韦氏家族的诗歌创作共计达到一千余首,诗人近百位,与之交往的优秀异姓诗人百余位,参与、主持十余起文学活动(事件)。此外,韦氏家族成员还编著文学别集、选集等各类著述四十余部。以上结果表明,京兆韦氏是促进关中文学发展和推动唐代文学繁荣的重要力量。遗憾的是,唐代文史学界却未对韦氏家族进行全面研究和深入的专题探讨。这无疑制约了学界对唐代历史、文学研究走向深入和精微。

基于此,本书以韦氏家族为个案,在纵向上,通过梳理韦氏家族在唐代的发展,研究该家族的文化遗产、文学观念和创作;在横向上,着重研究社会环境如科举取士制度、婚嫁关系等方面对韦氏家族文化及文学创作的影响。最后,本书对韦氏家族活动和文学成就进行综合研究,并以点带面地分析家族因素对于唐代文学发展、文风丕变的影响,展现唐代文学的基层状况,为“自下而上”观照唐代文学的整体情况提供家族视角。

-
- ① 关于京兆韦氏的宰相数量,迄今未有一致结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列16人为宰相,但在表后统计则曰14人,漏计韦安石、韦承庆二人。据笔者统计,京兆韦氏至少还有三位也曾拜相,即韦琮、韦宙、韦皋,《世系表》皆失载。《旧唐书》卷一八下《宣帝本纪》云:“秋十月,制以正议大夫、尚书户部侍郎、知制造、翰林学士承旨、柱国、赐紫金鱼袋韦琮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第618页)又见《新唐书》卷一八二《韦琮传》(第5369页)。《新唐书》卷一九七《循吏传》云:“(韦宙)还为大理少卿。久之,拜江西观察使,政简易,南方以为世官。迁岭南节度使。南诏陷交趾,抚兵积备,以干闻。加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第5631页)《新唐书》卷一五八《韦皋传》载:“乃诏皋统押近界诸蛮、西山八国、云南安抚使。俄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贞元十三年)帝悦,进检校司徒兼中书令、南康郡王。”(第4936页)《旧唐书》卷一四〇《韦皋传》亦有类似记载,见第3821页。可见韦琮、韦宙、韦皋三人都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且检校尚书省之仆射,是为宰相。当然,韦庄也是晚唐时期韦氏家族逍遥公房的杰出代表。他在王建割据政权中,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如果将其亦计算在内,那么,有唐一代韦氏家族就共出宰相整整20位。放眼唐代近三百年历史,包括山东五姓七族在内没有一个家族在拜相数量上能出其右。
- ② 唐代各士族名家拜相人数情况大致如下:赵郡李氏17人,河东裴氏17人,博陵崔氏15人,赵郡崔氏12人,陇西李氏12人,弘农杨氏11人,京兆杜氏11人,荥阳郑氏11人,太原王氏8人,范阳卢氏8人,琅琊王氏4人,河东薛氏、柳氏各3人。
- ③ 详见本书第五章“唐代京兆韦氏家族的婚姻”第二节“韦氏家族与李唐皇室的婚姻”。

二 学术史回顾

学界针对韦氏家族的片段性研究开始较早。在专著方面,王伊同在上世纪40年代写就的《五朝门第》一书中就对京兆韦氏有所涉及。此后台湾学者毛汉光在《中国中古政治史论》第一篇《中古核心区核心集团之转移》、《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三篇《中古家族之变动》、第四篇《中古士族性质演变》、第八篇《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第九篇《唐代大士族的进士第》,以及《唐代统治阶层的社会变动》等论著也对京兆韦氏有精彩论述。此外,孙国栋《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一文对其也有措笔。但他们的研究多以社会、政治为重点,而绝少涉及文学。大陆学界在新时期研究中,对此课题也有一定程度的关注。陶敏、王友胜《韦应物集校注》和孙望《韦应物诗集系年校注》为韦应物研究奠定了基础。傅璇琮《唐代文学丛考》之《韦应物系年考证》和《唐才子传校笺》,又对京兆韦氏之重要人物韦应物的生平履迹和交友行踪有所考订。刘金城《韦庄词校注》和聂安福《韦庄集笺注》的出版,又将人们对该家族中的知名文学家韦庄的研究推进一步。这些著述虽文献详实、资料齐备、结果可信。但总体而言,还都属于个案分析,缺乏对整个韦氏家族的系统研究与评价。近些年这一情况渐有改变。李浩师在《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一书第五章“唐代关中文学群体的构成”中,对包括京兆韦氏在内的关中著族的文学创作予以详细阐释。其另一著作《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第四章“唐代文学士族的地域构成”,又特设“关中士族群体”一节,对京兆韦氏的文化文学活动予以论述。

此外,吕卓民《长安韦杜家族》一书对韦氏自汉至唐的发展概况做了详细介绍,惜其未对韦氏家族文化与文学的关系以及家族变化发展的内外原因进行深入论述。杨东晨《韦姓史话》一书也对唐代韦氏加以介绍,细分源起、流布、盛事、文化、名人等部分,读来有趣,但缺少学术性。

截至目前以韦氏家族为对象的论文仍为数不多,主要是涉及韦氏家族的起源及发展历史、重要政治人物的政治业绩、韦氏成员的文学创作成就和作品等方面。此中又有相当一部分研究集中在墓志资料的发掘和整理上,如张蕴《西安南郊毕原出土的韦氏墓志初考——平齐公房和郕公房成员》《关于西安南郊毕原出土的韦氏墓志初考——逍遥公房和李夫人墓志》二文据考古出土的碑志石刻文献对唐代韦氏家族的房支加以梳理。周伟洲《新出土的四方北朝韦氏墓志考释》针对近年出土的韦戚夫妇、韦彪夫妇等四方北朝墓志加以考释和疏证。牟发松《新出四方北朝韦氏墓志校注》又重新对周文进行校正,并附墓志拓片图版。这些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韦姓人物在南北朝

时的活动情况较有意义。相关论文还有陈尊祥《唐韦几墓志考》、宋英《唐韦愔墓志考述》、焦杰《韦待价西征土蕃考》、刘呆运《唐长安南郊韦慎名墓清理简报》、王家佑《大足〈韦君靖碑〉与韦君靖史实考辨》、周腊生《唐代状元韦瓘生平事迹辨正》。令人欣喜的是,2007年11月在西安市长安区韦曲东北塬上韦应物一家的四方墓志发掘出土,随后马骥《新发现的唐韦应物夫妇及子韦庆复夫妇墓志简考》、陈尚君《韦应物一家墓志的学术价值》和李浩师《韦应物家族墓志补论》相继问世,韦氏家族在学界引起广泛关注。此外,还有部分文章对韦氏家族这一群体进行研究,如杨东晨《论韦姓宗族的形成与迁布》对夏商以来韦姓因国得氏及春秋以降韦氏宗族的迁移情况进行具体说明,为我们解读京兆韦氏房支族系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张琳《南朝时期侨居雍州的河东柳氏与京兆韦氏发展比较》则探讨了作为雍州豪宗大姓的河东柳氏和京兆韦氏的发展轨迹,并指出了二者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差异;荣新江《韦述及其〈两京新记〉》对韦述的生平事迹,以及《两京新记》的撰著年代、体例、内容和影响加以详细研究;马微《韦后的女性意识及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分析》认为韦后的许多措施,包括改易制度、大造符瑞舆论、参与大祭等,皆透露出女性意识。总体看来,这些成果仍然较少涉及家族文化与文学。这种境况与韦氏家族在唐代文史学界所具有的重要性及近年不断出土的韦氏家族文献材料相比,已严重不符。对韦氏家族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条件也日趋成熟。

在韦氏家族文学研究方面,韦应物与韦庄是韦氏家族人物中最受学界关注的作家。据不完全统计,从1995年到2013年间,两岸三地学界有关这两位作家的研究论文就有近370篇,其中包括硕士学位论文14篇,博士学位论文2篇。这些文章大多集中于别集和选集的版本梳理、作品的分析、生平履迹的考辨,极少从家族文化角度对他们进行解读和研究。另一方面情况是,对有作品存世的绝大部分韦姓文学家却仅有屈指可数的几篇文章,如张侃《韦孟韦玄成诗之雅颂余风与赋化倾向》、钟来茵《论“下笔如有神”是杜甫赠韦见素的诗》、张志烈《杜甫与韦偃》、方坚铭《韦昭度之死与吴融的诗歌创作》、浅水《韦瓘的行辈在李德裕之前》。可见,韦氏成员的文学研究仅是名家研究的附属,缺少独立成果。

总体而言,文史研究界对于京兆韦氏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对京兆韦氏的学术文化特征尚缺乏总体的观照,与之相联系的京兆韦氏家族绝大部分成员的文学创作和文化活动还尚未引起学界的充分重视,还未形成对家族全面、系统的研究,还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